本版编辑：海丽华
版式设计：舒胜花
E-mail:z4@studytimes.cn
Tel:010-68929831



没有路，就造桥

□ 韩中州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桥；云横黔岭家何在，万桥飞架越从前。化用这四句诗，前面是大自然出题，后面是贵州人答卷。这一问一答，揭示了贵州桥文化最朴素的哲学：没有路，就造桥，在群山围困中闯开出路。山高不过脚步，谷深不过人心，桥是贵州人写给大地的誓言，有的用石头，有的用铁索，有的用钢丝钢缆与混凝土。贵州人用超过3.2万座桥梁，彻底改写了群山阻隔的千年困局，硬生生绣出一幅连通天堑的锦绣画卷。

一

桥见贵州，首先要从石头桥说起。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显示，在贵州现存1400多座古桥中，石拱桥、石墩桥占很大比重。与北方赵州桥齐名的福泉葛镜桥是石头桥中的经典，400多年过去仍稳如磐石。明代平越人（今福泉）葛镜，见麻哈江渡口时常船翻人溺，便立誓修桥。第一次倒了，第二次冲垮了，家产耗尽，他立下“桥不成兮镜不死”的誓言，第三次终于建成。桥借山石为墩，在绝壁上凿出卯口，三孔尖拱，不对称地嵌进两岸崖壁。茅以升称之为“西南桥梁之冠”。因石料形似豆腐块，当地百姓叫它“豆腐桥”。桥成后第二年，葛镜便去世了。一个人用一生换一座桥，桥便不只是桥，而是一口气，一股贵州人不肯在险阻面前服输的倔强。

全青料石砌成的公馆桥是黔北单孔石拱桥的巅峰之作，位于绥阳与正安两县交界的赤尾溪上，因桥旁曾设官方公馆故名“公馆桥”。清光绪年间，正安知州郎承谟因春洪阻渡困于公馆场，遂动了修桥的念头，联合两地共同建桥。桥成于宣统元年（1909年），桥长约70米，单拱跨度约23米，桥南石阶47级、桥北为40级，护栏两端有整石镌刻的雄狮和浮雕图案，两边护栏正中部建有牌楼，其中一座镌刻楹联“石磴连云平雁齿，河梁偃月卧虹腰”，形象地描绘了公馆桥单孔高拱的建筑特点。公馆桥由官民共建共管，石碑上刻录了600余名捐助者的姓名及捐银数量。

横跨瀔阳河的镇远祝圣桥，始建于明代，建成于雍正元年（1723年）。桥身七孔连拱，桥面上曾建有三层八角攒尖的桥亭。当年，亭下有商旅歇脚，有书生赶路，有戍卒换防。桥连接的不只是两岸，还有湘黔驿道上无数人的来处与归途。

贵阳的浮玉桥，是石头的另一种性情。万历年间，巡抚江东之捐出千金，在南明河上筑堤建浮玉桥；又在桥的尽头垒石为台，台上建甲秀楼，期盼贵州“人文秀甲天下”。这座桥是贵阳城区最长的古桥，全长92米，宽7米，将一块巨大的鳌矶石与两岸相连，“鳌矶浮玉”的甲秀胜景，成了贵阳城400年来不变的文化坐标。

再往深处走，遇见的便是铁索与激流。悬在关岭花江峡谷北盘江上的花江铁索桥，是贵州颇具传奇色彩的古桥，它见证了中国桥梁建设从传统工艺向现代科技跨越的百年缩影，被誉为“贵州交通史的活化石”，同时它还是承载红色记忆的历史遗存。该桥1901年建成，桥长71.5米，14根铁链连接两岸，木板铺面。1935年4月，红军长征经过此地，红三军团在桥南岸的高地上阻击敌军，掩护主力红军西进。铁索在枪声中晃荡，木板在脚下呻吟，那座桥在那一刻不再只是过河的工具，而是一条生路、一道防线，见证了红军将士不畏艰险、向死而生的英雄气概。多年后下游建了电站，水位上涨，文物部门把铁索桥整体上移了20多米，铁链还是旧铁链，木板换成了铁板。

在黄平县重安江上，有三座桥由南向北并肩而立，史称“三朝桥”：清代的铁索桥、抗战时期茅以升设计的钢桁桥、20世纪90年代的混凝土拱桥。不足百米的江面上，三个朝代的桥排成一列。铁索是农耕时代的筋骨，钢桁是运输滇缅抗战物资的脊梁，混凝土是和平年代的坦途。站在岸边看，仿佛能听见时间从铁链上滑过，落在钢梁上，又沉入混凝土的力量里。

江界河大桥位于瓮安县境内江界河渡口上游，是中国首创的预应力混凝土桁式组合拱桥，1995年建成时是世界悬臂跨径最大的桁式拱桥，桥长461米，主跨330米。它不再依靠石头的重量，而是用计算与预应力把力量重新分配。从石头到混凝土，贵州的桥换了一种跨越的方式。

二

到了21世纪，贵州的桥开始往天上走。坝陵河大桥，2009年通车，主跨1088米，距水面370米，是世界首座山区峡谷千米级跨径悬索桥。桥边建有贵州省坝陵河桥梁博物馆，博物馆里陈列着古代桥的拓片、现代桥的模型，从葛镜桥的尖拱到坝陵河的钢桁，从花江铁索到北盘江的悬索，一部贵州交通史浓缩在几间展室里。

坐落在乌江源百里画廊之上的鸭池河大桥，2016年建成时是世界最大跨径钢桁梁斜拉桥，曾创下世界山区斜拉桥之最，获国际桥梁界的最高奖项“古斯塔夫斯·林德撒尔奖”。这座精美绝伦的红色桥梁，长1450米，两座H型索塔从两岸山脊间立起来，贵阳岸塔高243.2米，黔西岸塔高258.2米，把800米的主跨撑在峡谷之上。192根斜拉索从塔顶扇形对称展开，远远看去像两架竖琴面对面立在江上，风过时，弦不响，响的是人心里的悸动和震撼。乌江源的水清深碧透，喀斯特的山冷硬青灰，大桥的红便成了整条画廊里最醒目的存在，它不融入山水，也不冒犯山水。站在岸边看桥的人或从桥上驶过的人，享受的是黔山贵水的红情绿意。

花鱼洞大桥提着一篮清幽，在红枫湖上静候车来车往。它是贵州首座“提篮”式公路桥梁，充满美学设计感。与毗邻的红枫湖大桥及花鱼洞老桥形成三桥并行景观。它像一只红色提篮，两道拱圈向内微倾，轻轻收拢，兜住一湖碧水。雾天里红拱如朱砂落纸；晴天时朱红与湖蓝相映成趣。贵州的桥多以高长论“英雄”，但花鱼洞大桥主跨只有180米，可正是这座“小桥”，拿下了“古斯塔夫斯·林德撒尔奖”。获奖的理由是首创“旧桥建新拱、新拱拆旧桥”的方法，避免了爆破旧桥污染湖水。它能拿下大奖，靠的不是高度和跨度，而是生态建桥的工艺。

平塘大桥则是另一种气度。位于黔南州平塘的这座桥被称为“天空之桥”，有三座桥塔，中塔是世界最高的混凝土桥塔，高332米。塔身取当地少数民族服饰裙摆的意象，三座塔如三位少女立于槽渡河峡谷之上，最硬的工程却有最柔的造型。桥墩里浇筑的混凝土，用的是就地开采的机制砂，既省了钱也护了河。

最值得书写的是花江峡谷大桥。2025年9月28日通车后，这里便成为著名的网红打卡地。大桥桥面距水面625米，主跨1420米，“横竖都是世界第一”，大桥的主缆里植入了纳米光纤光栅，全天候监测桥体健康。站在大桥中央的玻璃观光廊道往下看，峡谷底部的北盘江微缩成温润的翡翠，那座看似近在咫尺的花江铁索桥，纤细得像一根丝线。两座桥一新一旧、一上一下，遥相呼应，隔着不到一公里的水平距离，垂直高差却仿佛跨越了一个世纪。

三

从公馆桥的石阶到花江峡谷的钢缆，贵州桥走过了一条很长的路。这条路不是直线，它有弯，有断，有倒了再修、冲了再建的反复。葛镜三次建桥，前两次都失败了；花江铁索桥修了又移，移了又修；花鱼洞大桥创新了施工工艺。山高谷深，绝地逢生的贵州人，把石头凿平，把铁链拉紧，把混凝土运到几百米的高空，把缆索从这山牵到那山，把一层层阻隔变成一道道风景。

这些桥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不是为了好看才建的。公馆桥为了赶路人不再被春洪冲走；葛镜桥为了渡口不再翻船；花江铁索桥为了茶马古道上的马帮能过江；坝陵河大桥为了让关岭到黄果树的车程从1小时变成4分钟；花江峡谷大桥为了让六枝到安龙的高速不再绕行。每一座桥的背后都有一个具体的、迫切的、人的需要。美是后来才有的，是桥建成之后，山水与人力达成的默契。

在贵州省坝陵河桥梁博物馆播放的视频里，筑桥者说过一句话：贵州的桥是被大山峡谷逼出来的。贵州的桥是绝处逢生的产物，桥越修越多，就有了各自的名字，有了动人的故事，有了碑文和对联。当今世界主要的桥型，你都能在贵州找到堪称范本的杰作。万桥飞架，让贵州实现了从“地无三尺平”到“高速平原”的华丽转身。一座接一座桥梁安静壮美地跨在峡谷上，把这片被山水隔绝的土地，一字一句地连起来，连得多了便成了一部桥梁史。史书的开头是石头，中间是铁与钢，结尾还在书写，用缆索和北斗定位，用机制砂和纳米光纤……

朋友，如果你来贵州，请不要只在桥上看风景，请用心去听去看，那一块块石头、一根根钢索里撑起的关于“连接”与“跨越”的故事。山还是那些山，但路，早已不是从前那些路了。

文化剪影

杜甫笔下的安西

□ 段培华

公元640年，唐太宗于西州交河城设置安西都护府。唐高宗时安西都护府的管辖地达到最大规模，包括天山南北、西至波斯的广大地域。公元718年，唐玄宗设置安西四镇节度经略使，下辖龟兹、焉耆、疏勒、于阗四镇。在历史上，安西四镇发挥了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巩固西北防务、维护唐朝对西域的有效管辖作用。唐代诗人王维的一首七言绝句《送元二使安西》让后世对安西有了更为深刻的印象。大唐尚武，涌现出王昌龄、岑参、高适等很多以写边塞诗见长的诗人，安西是他们笔下常见的地名。但人们却常常忽视了不以边塞诗见长的杜甫，也在其诗中多次提到安西，他以沉郁顿挫的诗句呈现出唐朝安西的另一种风采。

杜甫诗中多次出现交河。在他的笔下，安西是遥远的，而且环境艰苦。他在《前出塞九首》其一中写道，“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在《高都护骢马行》中写道，“腕促蹄高如踣铁，交河几蹴曾冰裂”“功成惠养随所致，飘飘远自流沙至”，形容安西远在西北的流沙、荒漠之地，而且冬天极其寒冷。杜甫的描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唐朝时，从长安往西出发，行至万里仍在唐境内。据宋人撰写的《南部新书》记载：“（唐长安城）开远门外立堠，云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戎人不为万里之行。”意思是说，当时朝廷为了不让西行之人畏惧路途遥远，特地公告，从长安往西只有九千九百里，没有万里之遥。

杜甫笔下的安西军锐不可当。虽然杜甫没有到过安西，但他在长安见过安西都护高仙芝，也曾在华州见过安西的军队。他在《高都护骢马行》中写道，“安西都护胡青骢，声价欻然来向东。此马临阵久无敌，与人一心成大功”，称赞高仙芝和他的骢马临阵无敌，一起建功立业。诗中还写道，“长安壮儿不敢骑，走过掣电倾城知”，通过评价骏马的神勇来盛赞高仙芝的英武不凡。当时，高仙芝远征小勃律，立下了赫赫战功。安史之乱爆发后，大唐征调安西军队赴中原平叛，杜甫因此写了两首关于安西军的诗。他在《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其一中写道，“四镇富精锐，摧锋皆绝伦。还闻献士卒，足以静风尘。老马夜知道，苍鹰饥著人。临危经久战，用急始如神”，对安西军的勇猛善战充满赞赏。事实证明，大唐能最终平定安史之乱，安西军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杜甫的描述和赞誉相当客观。

杜甫诗中的安西军队忠于大唐、军纪严明。杜甫在《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其二中写道，“奇兵不在众，万马救中原。谈笑无河北，心肝奉至尊。孤云随杀气，飞鸟避辕门。竟日留欢乐，城池未觉喧”。不同于其他藩镇军队，安西军是最忠于唐朝的军队之一。安史之乱后，赴中原平叛的安西军奋力与安史叛军作战，立下大功；留在安西的安西军，由于大唐逐渐丢失了河西、陇右，与长安长期失去联系，安西与中原通道断绝，但是安西的孤军仍然高举大唐的旗帜，坚守边关几十年。杜甫笔下的安西军不扰民也符合史实。《旧唐书·李嗣业传》记载：“李嗣业自安西统众万里，威令肃然，所过郡县，秋毫不犯。”值得一提的是，杜甫也敏锐地觉察到安西军队人数不多，只有约万人，这也相当准确。当时安西镇军队只有两万四千人，第一次从安西来的援军不到万人。据《新唐书·列传七十一》载，“肃宗驻灵武，发安西兵，栖筠料精卒七千赴难”。杜甫记录得准确，不愧有“诗史”之名。

与担任过武职的岑参、高适等人不同，杜甫是书生出身的文人，虽然他在困顿失意之时曾表达过想去边塞节度使麾下做一个幕僚的想法，但对杜甫而言，在长安辅佐君王更符合他的志向。他在《送从弟亚赴安西判官》中写道：“吾闻驾鼓车，不合用骐骥。龙吟回其头，夹辅待所致。”杜甫的理想是其《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中所写的那样，希望自己能“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安西的烽火，在杜甫的诗中不曾熄灭，精准的记录也为后世保留下鲜活的史实细节。那些关于疆域遥远的感叹，关于安西将领的赞誉，关于家国兴亡的思考，跨越千载，读之依然能感受到他那份沉甸甸的家国情怀。

史事小品

姥姥布袋里的麦香

□ 潘文曼

中秋回到乡下姥姥家，院子里老枣树下落了一层细碎的黄叶，秋阳斜斜照进低矮的灶房，一推门，一股熟麦的焦香扑面而来。姥姥正守着大铁锅做炒面，木铲在锅底缓缓搅动，雪白的面粉一点点被烘成温润的黄褐色，热气袅袅，漫过她花白的鬓角。听见脚步声，姥姥回头望我笑了一下，眼角的皱纹像被秋阳照暖的田垄。这一刻，许多沉在心底的往事，便跟着香气一同浮了上来。

我小时候很多时光，是在姥姥的农家小院里度过的。秋冬农闲，姥姥总爱炒上一大盆麦面。做炒面需下功夫。麦子是新收的，晒干扬净，姥姥用簸箕一遍遍筛去砂粒，再推到村口磨坊磨成细粉。大铁锅提前烧热，油也是自家榨的，黄澄澄的，舀一勺豆油进去，有时还会加一勺猪油增香，油在锅底滋啦作响，不一会儿就冒起细细的青烟，这时候才把筛得细细的面粉倒下去。火候要掐得准：太旺，面一下就焦了，发苦；太小，又煸不出那股子麦香。姥姥手里的铲子一刻不停，面在锅里沙沙地滚，颜色由雪白变淡黄，再由淡黄变褐黄。快出锅时，撒一把青红丝、芝麻和白糖，再翻几个个儿，就成了，一时间，满屋子便都是勾人的焦香。姥姥做炒面的时候，我喜欢蹲在灶边，看蓝色的火苗噼噼啪啪舔着锅底，看面粉在铲下沙沙翻动渐渐变了颜色，更喜欢闻那股醇厚香甜的气息。等盛出锅的炒面晾凉，再过一遍细箩后，姥姥便用干净粗布缝成的布袋，把炒面装进去封好，寒冬腊月里就有了信手拿来的美食。

炒面也叫油茶面、油炒面，在姥姥家辽南农村，是乡间很普遍的吃食。东北的冬季寒冷而漫长，作为满族的聚居地之一，这里一直有做炒面的食俗。早年间，女真人在林海雪原打猎或跨马出征时，就随身带有这种炒熟的干粮。据说，当年康熙皇帝东巡关外，也尝过这份民间滋味，并啧啧称赞。后来炒面的手艺代代相传，从行军赶路的干粮，变成了寻常人家炉灶上的吃食，逢年过节，还是走亲访友的一份赠礼。

吃一碗炒面，是我童年里顶盼的事。冬天放学回来，冻得缩着脖子，姥姥舀两勺炒面到碗里，提起暖壶开水一冲，筷子搅两搅，一碗稠糊糊的油茶就成了。我趴在炕桌上，一口一口吸溜着喝，又香又甜，热气从嗓子眼一直暖到脚底。有时等不及冲水，先抓一把干面塞进嘴里，香是真香，就是容易噎喉咙，呛得直咳，常常惹来姥姥嗔怪两句。姥姥有空便教我炒面，小小的我拿不动沉重的木铲，就拿一把小勺子在锅里胡乱拨弄，大半炒得深浅不一。姥姥也不嫌弃，依旧收拢装进布袋。



长大以后，我离开家乡去外地求学，每一次临行收拾行囊，姥姥的布袋子总会塞进我的背包。一袋自家炒制的炒面，沉甸甸的。她说在外读书，夜里饿了，开水一冲就能垫垫肚子。工作之后，离家越来越远，行李箱里面还是时常会有姥姥装好的炒面。人在异乡，窗外灯火陌生，冲一碗炒面，捧着碗站在窗前，仿佛能听见姥姥院里枣树叶沙沙作响。一袋炒面，便是老人朴素的惦念，隔着山水，跟着我去往各个地方。

多年以来，于我而言，炒面只是和乡愁、和对姥姥的思念联系在一起。但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对它产生出厚重的感恩情愫。成为党校教员以后，有一年我赴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研学，了解到志愿军战士以炒面充饥，坚持作战的各种感人事迹。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志愿军连续作战、山地穿插，补给难以为继，而炒面不怕冻、不易腐坏、不需要锅、不需要火，甚至不需要水，好包装、方便携带，成为当时的首选军粮。据相关资料记载，当时的炒面是由小麦粉和玉米粉、黄豆粉或高粱粉掺杂在一起的，因为小麦产量有限，供应不够，而其他成分也能弥补一点营养上的单一。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天气里，干燥的炒面配上冰冷的雪，全凭顽强的意志才能咽得下；长期单一食用，战士们普遍营养不良。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志愿军战士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展柜里，志愿军战士用过的装炒面的布袋，粗布缝制，针脚细密朴素，和姥姥缝的布袋竟有几分相像。黑白老照片上，年轻战士蹲在雪地里，抓一把炒面塞进嘴里，再攥一把雪送下去，这就是我少年时阅读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吃一口炒面、就一口雪”的场景。感动与感恩重叠在一起，恍惚间，那些烽火不再只是书里的故事，而是与姥姥的布袋、与我的乡愁重合在一起。

今年中秋回家，我又在姥姥的灶台前忙了许久。姥姥年纪大了，胳膊没从前有劲了，炒面这活儿便落到了我手上。如今的生活越来越好，市面上的成品炒面也改头换面，包装更加精致、内容更加丰富，五仁的、黑芝麻的、红枣枸杞的，还有无糖的、杂粮的等等，但总是感觉不如自家炒制的味道亲切。回忆着儿时姥姥教我的技艺，烧热锅、倒油、下面、翻铲子，那股熟悉的焦香慢慢升腾起来的时候，灶膛里的火苗一跳一跳，把姥姥的脸映得亮亮的。旁边不远处，女儿和小侄女也好奇地学着我的样子，胳膊不停地画着圈圈。姥姥看着这份传承，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月亮慢慢升上农家的屋檐，夜色渐渐铺展开。盛一碗刚冲好的炒面捧在手上，温热从手心传到心底。一碗油茶面，藏着先民生存的智慧，载着满族民俗的传统，记着烽火岁月的赤诚，装着寻常烟火的温情。一缕麦香跨越漫长时光，始终烟火不断，初心绵长，岁岁温热。

自得园